

苏联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社会学和现时代

第二卷

20 世纪后半期的资产阶级

社会学

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中资产

阶级社会学的现状

苏联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社会学和现代

第二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СССР
Институт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Социолог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II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77г.

翻译：李振锡 钱 诚 娄 华

社会学和现时代

第二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15
1980年6月第1版 1980年6月第1次印刷
字数：342,000 册数：9,500

统一书号：3011·155 定价：~~1.15~~元
1.40

内部发行

本卷在翻译过程中，曾得到郑跃华同志的大力帮助。同时，范国恩、朱莉、杨允中、于德光同志参加了部分翻译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译 者

目 录

20世纪后半期的资产阶级社会学

第一章 资产阶级社会学思想演化中的一些新倾向	2
一、资产阶级理论社会学的危机	2
二、资产阶级社会学寻找一般理论	20
三、从自然主义到主观主义	38
四、实证主义趋向和人道主义趋向在价值观 问题上的斗争	65
五、“新马克思主义”和“左派”激进社会学	74
第二章 资产阶级社会学企图预言未来	123
一、“技术统治社会”思想的破产	123
二、“后工业社会”观点的奇论	142
三、资产阶级所幻想的“新型社会”在 科学上是荒唐的	153
四、社会学与未来学	167

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 社会学的现状

第三章 美国社会学	178
-----------	-----

一、美国学院派社会学体制化的某些特点	178
二、美国社会学中的唯科学论倾向。结构 职能主义流派	181
三、把社会描写为过程的理论社会学流派	205
四、美国社会学中的“人道主义”流派	210
五、美国社会学中自然科学流派和“人道 主义”流派之间的区别	224
第四章 英国社会学	228
一、英国社会学的形成及其概况	228
二、英国社会学的主要理论传统	239
三、社会学理论和社会认识的认识论中的 最新倾向	250
第五章 法国社会学	277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法国社会学的特点	277
二、1945年以后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学方针的 改变。新的体制化领域	284
三、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本理论倾向	288
四、最近几年来法国社会学的变化。马克思 主义影响的加强	308
第六章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社会学	319
一、复旧倾向的优势	319
二、唯科学实证论倾向的“热潮和进攻”	326
三、危机倾向的增长：社会学的“自我批判”	339
四、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社会学的危机。 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发展与深化	352
第七章 意大利社会学	384
一、20世纪上半期意大利的社会学	385

二、战后时期意大利的资产阶级社会学.....	391
三、意大利社会学的“激进化”.....	400
结束语 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现状与马克思主义	
批判的任务.....	418
附 录 关于第八届世界社会学大会的几点	
总结和第九届世界社会学大会的准备.....	431

20 世纪后半期的 资产阶级社会学

第 一 章

资产阶级社会学思想 演化中的一些新倾向

一、 资产阶级理论社会学的危机

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学与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思想斗争，也和扩大社会学知识的各种流派的代表人物之间的联系、交换学术情报的过程一样，它们的特点取决于现实的政治形势。这就不可能不影响到在那些有代表性的国际社会学研究中心，而首先是在历次世界社会学大会上所进行的争论的内容和性质。第八届世界社会学例会在这方面究竟有些什么表现呢？^①

前来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全世界八十个国家的三千多名学者，其中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意大利、日本的代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一大批社会学家也出席了会议。很有代表性的、拥有八十多人的苏联代表团（团长是Ф·В·康斯坦丁诺夫院士）和保加利亚、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古巴、波兰、罗马尼亚、

①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庇护下于1949年成立的国际社会学协会，自1950年起召开世界大会。这里所说的第八届世界社会学大会，是于1974年8月19日至24日在多伦多（加拿大）举行的。

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各代表团参加了会议。

会议是在良好的国际形势下进行的。这一形势之所以能够出现，首先因为有苏共和苏联国家的一贯爱好和平的对外政策，有苏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和平纲领。巩固和平、加强国际安全是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坚定而目标明确的方针，这一方针符合社会进步的迫切要求，引起我们星球各个角落千百万人们的同情，有助于社会主义这一社会制度的威望的提高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传播。

在这种条件下，资产阶级社会学界出现了著名的“对价值观的重新评价”。热衷于重复反共宣传的陈词滥调的学者越来越少了。正如会议情况所表明的，学术争论中的粗暴反苏攻击现在已经少见了。这种攻击（尤其在加拿大报刊上）虽然也曾发生过，但是，基本上是“围绕会议”的。如某些带着明显的外国口音讲俄语的人，为“我们的俄罗斯”的民主而进行了斗争；居住在加拿大的许多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曾为“乌克兰独立运动”的命运而劳神费心；犹太复国主义者们，披上了居住在苏联的“犹太人的保护者”的外衣。在多伦多大学的一座建筑物里举办的反苏书展未曾受到代表们的注意，而且连坐在书柜后面的那些青年人本身（据查明，这是一些被雇用的按日取酬的临时工）也未表现出特别热心。

会议的主要论题——《当代社会中的科学与革命》——促进了就一些最尖锐的社会政治问题所展开的争论，第一次全会专门对这个题目进行了讨论。在以后的三次全会上讨论的问题是：《社会学家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上：观察者还是参加者？》、《人口变动与社会发展》、《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平等：理论问题和经验问题》。除此以外，在大会范围内还进行了一百

多项学术科目（工作小组、“圆桌会议”、研究委员会、讨论会、专门会议）的活动。总共听取了近两千个报告和六千个发言。只要列举一下在会议上讨论的一些问题，就足以说明它们是十分广泛的。这些问题涉及到社会结构、生活方式、都市化、文化、科学、教育、新职业、制度演化、政权、对文明的理解及研究文明的方法、个人的志向和要求及个人同社会的相互关系、未来学、工会的作用。会议期间还就民族和种族问题、发展中国家所发生的变化性质的性质、民族运动、国际关系的迫切问题，都详细地交换了意见。详尽地研究了诸如家庭、妇女地位、青年、老年人等社会学问题，研究了闲暇、迁移、贫困、劳动、政治、法律、宗教、体育、生态学、社会语言学等问题。在研究诸如社会学研究的逻辑学和方法学、对文明的比较分析、社会指示器、社会学中的形式化这样一些一般理论问题和和方法论问题的同时，还研究了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直到加拿大社会中的语言关系和民族关系）。

在本卷附录中记述了苏联代表团参加第八届世界社会学大会的总结。在这里，我们只谈谈在这次国际性学术交流当中所清楚地表现出来的、我们认为主要的一些倾向。

会议上的辩论再一次表明，社会学属于最“政治化的”社会科学，在社会学中，阶级立场——明显或不明显地——决定着一般理论方针的实质，没有一般理论方针，具体的社会学研究是不可思议的。在试图说明（每个人都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整个人类社会和某些个别社会的制度和职能、从社会生活的一些形式向另外一些形式的过渡和我们时代社会进步的规律性，并试图预料未来的一些基本轮廓的时候，资产阶级社会学家们明显地反驳了西方报刊所吹嘘的这样一种观念：社会学是一门“非常经验的”科学，主要是从事调查表的编造、散发和处理。

现在，甚至许多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也把承认一般社会学理论的重大意义作为自己的出发点。正因为如此，大会的绝大部分工作是探讨当代的社会生活的一些极为重要的理论问题。

正是在这方面，在一般哲学和社会学理论问题上，在分析社会过程的方法论问题上，首先表现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学的无可争辩的优越性。用社会发展的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已经能够深刻地认清一些形形色色的新的现象和过程，揭示我们时代的主要社会趋向。他们所提交的报告，在理论水平方面超过了资产阶级学者们的报告。苏联的社会学家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在辩论中占了主导地位。他们的坚定的目的性和坚强的思想信念，在笼罩资产阶级社会学界的理论真空和思想上方法论上的混乱的背景下特别清楚地表现出来了。由于无法提出统一的、最普遍的社会理论，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代表们不得不一再重新回到陈腐的、早已威望扫地的理论上去，多半又是回到所谓的工艺决定论的翻版上去。这种工艺决定论，在方法论上是以结构职能分析的思想为依据的。

在讨论大会的主要论题《当代社会中的科学与革命》时，这一点表现得十分明显。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在报告和发言中阐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科学技术革命的实质和社会意义及其同社会革命的联系的观点。大家知道，首先对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科学技术革命进行理论分析的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个革命意味着彻底改造生产力，改造社会生产的全部技术，包括材料、机器系统、能源过程的利用，以及改造组织和管理形式。在生产过程中，物质财富生产者本身的作用、其劳动的条件和劳动性质正在发生本质的变化。简言之，就实质来说，科学技

术革命是发展生产力的现代化手段，这种手段的特点是越来越多地把科学变成直接的生产力。科学技术革命意味着整个社会劳动的智力化水平不断提高，它对社会结构、教育和文化的发展、人口过程、日常生活和服务领域、人们的思维方法和心理等社会生活的各种过程和现象，对社会和自然界的相互关系，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们在发言中着重指出，科学技术革命是一种全世界性的现象，可是，开展科技革命的条件、其推动力和社会后果，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下是有原则区别的。这种区别是由社会主义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两者目的不同而决定的。在贪得无厌地追求利润和阶级对抗的条件下科技革命的开展带有自发性，并会大大加深资本主义的矛盾。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的条件下，科学技术革命是有计划地进行的，它加速旨在完善社会关系、全面而协调地发展所有社会成员的个性的过程。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科技革命不产生任何问题，比如说在改进教育制度、保护自然界等方面的问题。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些问题能够在科学技术不断进步、进一步利用科技成果造福于人民的基础上顺利地加以解决。

要真正了解科学技术革命的实质，非把它同社会革命联系起来不可。科技革命加速在全世界范围内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客观先决条件的形成，为了本身的发展它迫切需要建立生产资料公共所有制和有计划地进行经营管理。换句话说，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科技革命才有可能为了劳动群众的利益而深入地 and 不断地开展，因而把科学技术革命成果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结合起来的问题，是一个中心问题。

在如何评价科学技术革命这个问题上，最近十年在资产阶

级的社会学和哲学文献中，明显地形成了两种表面上互相对立的倾向。其中比较流行的，尽管有些勉强，但可以称之为乐观的倾向，它反映了一种希望，即能够利用科技革命成果来实现资本主义的“更新”和现代化。持这种倾向的人认为，技术和经济的发展是一种同所有制关系和同生产关系没有联系能独立存在的东西。正是这个在方法论上是错误的出发点，成了许许多多诸如“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技术至上社会”以及其他社会的理论。上述种种理论虽然当中有某些细微差别，但其实质是一致的。这些理论的提出者都是把普遍的社会“和解”和共同幸福时代的到来，仅仅和工业、技术、科学的进步联系起来，好象到那时当代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对抗会自行消亡。

另一个倾向显然是悲观的。其代表者们——直截了当地或者有保留地——指责科学技术进步带来了当代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灾难：失业增长、环境污染、核危险等等。这些人往往很熟练地揭露帝国主义的某些丑恶方面，但他们同时主张暂时停止技术进步以避免“即将到来的大灾难”，而他们之中一些人甚至用新式卢梭主义精神鼓吹“重新回到自然界去”，从而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缺陷和不合理性同整个现代文明的性质混为一谈。这些学者们的类似“一切从零开始”的建议，带有明显的空想性。

不难看出，虽然这两个倾向各有不同的最后结论，但它们的相同之处在于抛开原则上对立的社会条件来看科技革命，在这基本的、主要的一点上它们都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经济结构的学说、与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相对立的。

这些流派在社会学界所占的比重在不同的社会科学领域、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而有所不同。在加拿大，“工

艺决定论”思想的新翻版曾经居于首要地位，这种思想不同于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曾风行一时的简化方案（如Y·罗斯托的颇有点儿小名气的“经济增长阶段论”等等）。

70年代初流行了一种“工艺决定论”的温和的乐观主义方案。这种方案是1973年H·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一书里提出的。这本书在美国成了“畅销书”，而《美洲》杂志（1974年9月第215号）甚至认为需要向苏联读者介绍贝尔的思想。^①在多伦多大会上，很多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在发言中都援引了贝尔的这本书，或者赞同它，或者批判它。

贝尔方案的实质是这样的，在每一个主要社会领域中，似乎都有自己的“发展轴心”。沿着一个轴心——技术经济轴心——社会从“前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然后再向“后工业社会”发展。贝尔预言，到20世纪末，“后工业社会”至少在美国会到来。沿着第二个轴心——所有制关系轴心——社会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然后再向社会主义发展。贝尔还谈到政治发展轴心和文化发展轴心。意思是说，所有这些“轴心”，尽管在某种程度上能互相影响，却是各自独立的。由此可见，事实上贝尔提出的不过是“因素论”复杂化的方案。马克思主义者早在19世纪就证明了这一理论的不科学性。

“轴心学说”被贝尔用来论证关于两种对立的社会经济制度必然趋同的庸俗不堪的概念；这个概念认为每一个社会，不管其社会制度如何，都或早或晚会走向同样的“后工业社会”；而美国一马当先，超过其他国家，正在走向这种社会。贝尔认为，这种社会的实质在于它是围绕着理论知识即科学而组织起

① 对贝尔的这本书的详细批判分析见苏联《哲学问题》杂志（1974年第2期）和《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杂志（1974年第4期）。

来的。科学家、教师、工程师将成为这个社会的统治阶层。当然，这一切都是在维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条件下发生的。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又一个技术统治的空想，其资产阶级辩护士的实质是显而易见的。

由于 H·贝尔拒绝在第八届世界社会学大会的全体会议上发言，所以西德的社会学家 P·达连道夫就成了技术统治倾向的最重要的拥护者。达连道夫运用颇能说明“共同市场”各国用于科学研究和试验设计工作的巨大费用的数字（1973年“九国”的费用为170亿美元，每年增长10%），强调了由于科学技术革命的影响而发生的“社会经济气候变化”。“科学既是生产关系的要素，又是生产的强大力量”这个思想，在他企图“运用马克思的语言”来表达的观点中，占了重大地位。达连道夫企图把学术机构和教学机构数目的增长和由此而来的科学家、教师、工程师队伍数量的增加（毫无疑问，这会引起社会的社会结构上的变化），说成是新的“启蒙者阶级”的成长和生产关系的自动变化。在这里，他忽视了这样一个根本的和带决定性的情况：生产关系首先是所有制关系。达连道夫过细地列举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目前所经受的重重困难，然而却得出完全没有根据的结论：“社会能够发展自己的结构，以便利用新的可能性来避免以前常有的各种形式的离心离德及至革命动荡”。他在这里谈的是“一般社会”，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也在内。这位社会学家向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家和统治集团推荐的药方远远不是什么新货色。这个药方要人们善于考虑科学技术革命的潜力，更加努力去“追求高质量发展的新社会”。达连道夫和贝尔一样，他把这种“新社会”理解成这样一个社会：在那里，商品生产的优先地位让给了服务性生产，让给了教育和卫生保健的发展和环境保护，也就是说，让给了在西方通常称之为

“生活质量”的所有那些东西。“生活质量”这一概念需要加以解释。资产阶级思想家和政治家们把这个概念积极地运用于思想斗争，尤其在竞选运动期间。在资产阶级社会学家们的词汇里（如在多伦多的一次专门研究生活质量问题的“圆桌”会议上），“生活质量”这一概念在加了各种各样的指标：技术指标、人口指标、经济指标、城市建设指标以后，便成了万应灵丹。它能使群众坚信，似乎处在“技术文明”条件下的资产阶级社会能够保证丰富多彩的生活、个性的自由、人类的团结、环境的保护等等。他们企图使人们相信，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似乎经受着同样的困难，有同样的弊病，因而，总的来说，正在解决同样的问题。同时，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鼓吹者引用某些数量指标，以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科学技术革命而拥有比过去多得多的物质财富的例子来证明“自由经营”社会的优越性。

在这个“圆桌”会议上发了言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们令人信服地论证了：由于资产阶级社会学家是抱着他们所特有的抽象的非科学态度，所以生活方式的极其重要和实质性的特点就都未包括在其视野范围。这种特点是由社会经济制度、满足个人需要的途径、个性发展的条件以及参加公益事业所决定的。那些用资产阶级观点评论“生活质量”的人，往往忽视产生激烈竞争、阶级压迫、剥削、失业和广大人民群众无权现象的私有关系体系的社会道德和心理特点，从而想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那些质量上崭新的、公正的、高度民主的人道主义的特点一笔勾销；而只有这些特点才能保证人所应有的生活。

达连道夫和贝尔提出的工艺决定论观点，实际上非常相似；这种理论的不同提法现在出现了很多。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无论是在这次世界社会学大会上还是在会议前，都揭露了他们